

新旗

第七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全面內戰終於打起來了，不管發動者的「信誓旦旦」，不管人民大眾的奔走呼號，牠終於打起來了。現在看來，事情是很明白的，過去一年的談判與調解，在發動者方面都不過是一種備戰的烟幕，拖延時間的手段。中共，尤其是一般老百姓，事實上上了當，中了美國與執政黨聯合設定的狡計。

現在事情太明白了，美國扯下了牠和平神的假面具，統治者也最後丟下了他鐵拳上的羊皮手套，砲口代替了唇舌，議場移轉到了戰場。沒有一個和平主義者再能保住他可憐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幻想家再能看到玫瑰色的和平景象。善心的人們若有所悟地喊出了「人民自己解決」的口號，被騙了的延安也大叫着「搨起鎗來」了。

「搨起鎗來」，到了無奈何的時候也只得這樣幹，最頑固的反動派是祇懂得在鎗口上頌教的；不過對方的力量太大了，牠背後站着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光是鎗無法取勝於內戰。同時鎗終究不能解決政治問題。爲了人民大眾的利益，甚至爲了中共的利益，要想有力地反對統治者所強加於我人身上的內戰，都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政治立場雖然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但有時候抽象的立場却能大大地強過那具體的鎗炮。

一些能從思想上取捨一種態度的人，自然可以從「民主與反民主」之類的標準來決定是非，放棄「中立」；但戰爭終究不是幾個少數知識份子打的。而且，即使是知識份子，也不能懂受幾句空洞口號的影響。要使一方面的戰爭成爲進步，要使幾萬萬人擁護這個戰爭，因而獲得勝利，那末這戰爭必須有個進步的政綱，實行這個政綱，由此來保障幾

萬人的利益。

內戰與對外戰爭不同，誰勝誰負，更多地決定於誰的政綱革命，誰的政綱反動，誰的政績優良，誰的政績腐敗。

中共目前的政綱與政績，無疑是較爲進步的；但要想在力量如此懸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這樣的政綱政績顯然還不够得很，甚至有許多錯誤地方，會在客觀上幫助對方的勝利。

那一些是不够而必需改進的？例如：半吊子的土地改革必須代以徹底的土地革命。

那一些是錯誤而必須改變的？例如：官僚外交式的談判必須停止；政治上無原則的買賣，有如改組政府或「聯合政府」的磋商，必須結束；「利用馬歇爾的幻想必須拋棄……

不過最重要的，中共必須立即改變牠的全部基本立場，必須立即丟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放棄階級合作政策，重新站在無產階級與廣大城鄉貧民的

第七期目錄

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馬歇爾元帥的新勝利	劉默
從工人立場看外國新匯率	舒嚴
印度革命悲劇	蘭因
威爾斯逝世	唐盛
大戰留下的創傷	E. Atwood
硬殺與軟綁	木君
論「中間派」(上)	鳳岡
選舉和示威(法國通信)	朱海聲
一篇值得學習的追悼文(讀者論壇)	守敬
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讀者通信)	華世明

發行所：新旗社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立場上，徹底發展階級鬥爭，堂堂正正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名義之下，進行深刻的社會革命。

放棄了依賴美國調解的幻想，同時放棄了與執政黨組織『聯合政府』的念頭，牠應該集中一切力量，去爲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而奮鬥，讓全體人民自己來解決當前的一切問題。

祇有這樣，工農大眾才能承認中共是他們自己的黨。祇有這樣，全體民衆才能認識共產黨不是爲一黨的私利而爭，乃是爲真正的民主而戰。祇有這樣，中共以及一切被壓迫的老百姓，才能經受得住統治者『平亂』的鎮壓，並由此走向勝利。

我們希望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能够考慮我們的建議。

馬歇爾元帥的新勝利 劉默

馬歇爾元帥奉命來華，調處國共衝突，奔走十個月，終於自認失敗了。有人說：『馬歇爾贏得了世界戰爭，但贏不到中國的和平。』

真是這樣的嗎？我們可不這樣想。馬歇爾在世界戰場上是勝利的，在中國戰場上也同樣是勝利的。馬歇爾沒有失敗。他這次的失敗便是他的勝利。

怎麼說失敗便是勝利呢？一句話，馬歇爾到中國來自始就不會想造成民主的和平。他也許真想造成一種『和平』的，但那不是我們所要的和平，也就是說，不是民主的和平。他想造成的乃是美國經由國民黨在中國施行的一種獨裁的和平，即不容許人民大眾以及反對黨派說話，批評或『作亂』的一種『和平』。他要的和平是綏靖，是鎮壓，是平定，是……，只不是民主的和平。

十個月來，馬歇爾元帥，亦即杜魯門總統，亦

即華爾街的巨頭們，在中國所成就的不可小呢。他使美帝國主義政策蒙上了仁慈和平的面具，他使國民黨軍隊的戰略地位大大地改善；他替國民黨加速練成了幾十師美化部隊；他相當穩定了國民黨治下的經濟危機；他很巧妙地使內戰的責任放到共產黨肩上。

成就了這些之後，如今是『失敗』的時候了。『不歡喜失敗』的將軍於是坦然承認了自己的失敗，發表了失敗的文告，文告上還連署着一位悲天憫人的司徒大使。這樣增加了力量，讓人們更加感覺到中共的『好亂』，同時更加感激這二位慈祥老人的美意。

馬歇爾元帥是以『失敗』來完成其勝利的。他過去的成功是替美國與國民黨爭取了十個月的備戰時間，今天的失敗則是昭告了備戰的完成。因此馬歇爾的失敗聲明，實際上是華盛頓經過他的前任參謀長對國民黨所下的進攻命令，他命令國民黨進攻共產黨，亦即進攻蘇聯在中國的前哨。

中國的全面內戰果然打起來了。但這位『和平老人』並不以『辱了使命』而『憤然歸國』，有似一般天真的中國人所想像的。他還留在中國，而且悠然地住在廬山，做着我們『最高當局』的貴賓，詩人似地欣賞着我們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血肉飛舞。

有誰還願意拿『救主』等肉麻稱呼奉送給這位老人嗎？有誰還對這位元帥存着絲毫幻想嗎？更有誰還企圖把他和美帝國主義的好戰派分開來嗎？如果在事態如此明白了的今天，居然還有人保持此種態度，那是再不能讓人原諒了，我們祇能稱他們做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不過，爲使人們將來不再發生新的幻想起見，我們現在就得指出：馬歇爾或代以他人的美國再度『調處』，完全是有可能的。美國並不能讓中國的

內戰無限制地打下去，而且，可能發生影響的因素又太多了。假如一，國軍未能在較短期內圓滿地完成馬元帥給定下的計劃；二，戰爭形勢或者竟於國軍不利；三，內戰遷延而美國國內市場又迅速地達到了飽和點，以致美國不得不注意市場資格的中國；四，內戰引起了蘇聯與英國的積極抗議；五，以很高代價業已換來了美國在中國所必需的一切具有戰略意義的點與線；六，中國國內廣大民衆反戰運動之繼續高漲，甚至影響士兵的厭戰情緒；——祇叫發生了上述那一個有利或不利於美國的情勢，都會叫馬歇爾元帥再度熱心起來，『替我們中國老百姓』調處國共之戰的。

總之，除非美蘇之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快打起來，則美國對中國的內戰，一定還要採取時而『調處』時而『不管』的態度。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態度這裏倒是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的，即無論如何不應相信美國對華政策的『美意』。

從工人立場看外匯新匯率 舒 嚴

八月十九日開始，外匯官價從二〇二〇元法幣對一元美金，忽然一躍而爲三三五〇元法幣對一元美金了。幾個月來比較平靜的物價又波動起來了。

行政院長宋子文說明此次調整外匯匯率的理由，說是現在法幣對外的購買力高，對內的購買力低，是很不好的，此次匯率調整以後可使國內國外幣值得到合理的調和。他希望新匯率實施以後能得到下列幾種良好結果：(一)鼓勵輸出，減少輸入；

(二)激導僑民匯款回國；(三)扶助國內生產事業。我們試看看，要合理調和國內外的幣值，要得到上述那三種結果，是否除了抬高外匯(即法幣

貶值)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呢?現在用的抬高外匯方法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呢?

不錯,現在法幣對外購買力高,對內購買力低,是事實,也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要調和這兩種購買力,有兩種方法:一是『貶值』,即降低法幣對外的購買力,以遷就對內的購買力,如目前所開始施行的;一是『增值』,即抬高法幣對內的購買力,以遷就對外的購買力,這是人們不會採用的。

在某種情形之下,貶值自然是一種解決方法,例如對於某一國家經濟,輸出是比輸入更重要的,要在世界市場上與他國的輸出競爭,則自國貨幣貶值的確能够鼓勵輸出。但中國情形不同。在中國經濟上,幾種農產品底輸出并不佔十分重要位置。戰後,中國需要的是工業的建設,而機器及其他建設材料都須從外國輸入來。法幣貶值,對於輸出業補助很有限,而輸入業則立刻大受其虧了。

有人問道:中國固然需要機器及其他建設材料輸入來,可是跟着這些東西,外國製成品也要輸入來,同國貨競爭,如最近幾個月所見的情形呀。結果舊的經濟基礎都要崩潰了,還談甚麼新建設?

我們回答:中國不是獨立的國家麼?不是關稅能够自主的麼?不是外匯歸政府管理的麼?我們需要的東西,可以減低稅率,甚至免稅;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可以抬高稅率,甚至禁止進口,又可以以供給外匯。如此,那些能够同國貨競爭的製成品是不會跟着機器輸入來的,中國自己的工業是不會感受威脅的。

又有人問道:法幣貶值是一紙命令能够做到的,但法幣增值談何容易!必須中國已經走上建設軌道,經濟開始復興,然後才談得上法幣穩定,然後才能談得上法幣增值。現在增值既不可能,不是

祇有貶值一條道路麼?

我們回答:增值固然不是一紙命令可以做到,但并非不能開始去做的。法幣在國內的購買力何以日低一日呢?不是爲了通貨膨脹麼?通貨爲甚麼膨脹呢?大部分是爲了軍費支出。對外戰爭停止一年了,世界各國都沒有戰爭了,惟有中國還供養着幾百萬軍隊,還在內戰,而且大規模的全面的內戰,每日消耗無量數的生命和物資,生命不值錢,物資則必需補充呀!現在除了鈔票印刷機之外沒有別的補充物資方法。所以祇要內戰停止,軍備裁減,通貨就減少或停止膨脹的,因之物質也會低降下來,即是法幣在國內的購買力可以漸漸抬高了。可見增值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又有人問道:你們的辦法是要依靠一個『好政府』來施行的,惟有『好政府』才能保持國家獨立,關稅自主,外匯管理,才能消弭內戰,裁減軍備,停印鈔票,降低物價。總之惟有『好政府』才能使法幣增值,這個『壞政府』,如美國『時代雜誌』所稱的,是不能施行你的辦法的。如此,現行的貶值辦法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麼?

我們回答:在『壞政府』之下,不僅外匯問題不能好好解決,一切問題都不能好好解決的。增值既不可能,但貶值果真能解決問題麼?即果真能如宋院長所期望的,合理調和國內國外幣值,因而得到那三種良好的結果麼?明眼人都知道是不能够的。八月二十日文匯報記某經濟權威底觀察,說此次變更外匯匯率,對於工商業底危機,不過『打了一記強心針』,并不能根除危機底病源。事實上,這一記強心針即便發生了效力,勉強調和了國內和國外的幣值,但祇要通貨繼續膨脹,法幣底國內購買力又要降低的,即不久之後國內和國外的幣值又是不能合理調和的。而且今後通貨膨脹還要更加迅速

因爲匯率一變更物價更要漲得快了,——不僅航來的美國貨要漲價,連自己的國貨和土產都要漲價,衣食住行件件都要漲價。這是匯率變更後第二日我們在市場所親見的。外匯抬高既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又使目前人民生活更陷於苦難。

這是我們工人首先關心的問題。上海吳市長代表政府向我們保證:『衣食住行四項決不漲價』。吳市長說的理論論,他認爲這四項大部分不是舶來品,與外匯無關,他勸告工商業家『顧全大局』勿乘機抬價。但實際上,外國貨貴了,中國貨,無論原料是外國來的不是,都要跟着貴的。黑市米已經從六萬元跳至七萬五千元了。至於勸資本家『顧全大局』,無異於向老鴿宣傳真節。

『依照生活消費指數計算工資』,這是戰後工人鬥爭所得的最大勝利品。在這資方反攻的形勢中,七月份上海工潮,因解雇工人而引起的,已佔百分之四七了。現在匯率變更以後,資方還要加緊向工人進攻的,首先要進攻這『生活消費指數計算工資制』。或者明白進攻,或者在編製指數時出花樣。我們必須爲保衛這最大的勝利品而鬥爭。

印度革命悲劇

蘭因

印度吸引了注意力。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在加爾各答及其他城市互相殘殺,死傷的,據說有幾千人至萬餘人。有人說,這是『悲劇』。

可是這還不是印度革命悲劇。現在大家都注意宗教的衝突。但另一種更根本的衝突,或者在醞釀中,或者已經爆發了,但尚未引人注意或被人故意隱瞞着。那就是階級的衝突。

印度廣大羣衆久矣在鬥爭中了。羣衆鬥爭不僅在鄉村,而且在城市,不僅在城市工人,而且在海

軍兵士。饑餓的人羣曾舉行廣大的示威，孟買「賤民」起來反抗，將近一百五十萬鐵路工人要同盟罷工，海軍兵士竟公開嘩變。這一切是印度局勢底基本因素，是現在中國及其他東方國所沒有的。

這些因素決定了英國帝國主義最近有的「恩典」，即讓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又決定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國民大會黨接受這個「恩典」。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麼？——這是一個半世紀以來所沒有的事情。英國本身雖然在此次大戰中削弱了，但若非下層羣衆如此蓬勃反抗，決不肯欽賜這個「恩典」的。然而這個「恩典」本身畢竟是一種騙局：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但國防，外交，交通等等大權仍須操在英國手中。印度政府不過是這個「東印度公司」底買辦罷了。尤其量，也不過是非律賓「獨立」政府底地位。

印度資產階級不比菲律賓資產階級，以前是不能滿意這種「獨立」的。可是現在，在廣大羣衆崛起之前，甘地，尼赫魯，阿柴特及其他國民大會黨領袖都急忙接受這種「獨立」了。

殖民地資產階級妥協成性，尤其當工農羣衆走到牠的前頭時候。這是我們熟知的經驗。

印度需要真實的獨立，不需要非律賓式的獨立。工農底地位以及整個印度底經濟，在那仍受英國操縱的印度人政府之下是沒有改善希望的。印度必需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政府，但惟有工農羣衆組織的政府才能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政府。印度工農羣衆有力量組織這個政府，現在欠缺的是覺悟，是自己的黨。印度已有真能代表工農利益的黨，可是力量還小，還不能領導羣衆去與國民大會黨或回教同盟相對立。

印度革命再向前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的黨領導之下，將減輕宗教人種，等級間的差異，將團結一

切被剝削者去對抗一切剝削者（無論是外國的或本國的），將走上勝利的道路了。反之，如果工農大衆繼續信任資產階級領導，幻想經過這種「恩典」可以達到真正的獨立，那是一定要失望的，一定要重演中國革命悲劇的。

中國工農願以鮮血換來的經驗貢獻於印度兄弟羣之前。

威爾斯逝世

唐威

威爾斯死了。他的文學，他的歷史學，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爲人，當這蓋棺時候，國外和國內已經有好多人在紛紛議論了。我們這裏祇要說起他生時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他死前幾個月做的事情，爲國人所不知道的。

那就是他曾政書紐倫堡戰犯法庭，要求徹查一九三六——三七年——三八年莫斯科幾次黨獄諸被告與納粹戰犯之間的關係。

這事，須得從頭說起。

距今十年前，發生了一件震動世界的事情，即是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大審判，被告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及其他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爲了勾結納粹陰謀出賣蘇聯罪名被判決死刑或長期徒刑了；不久之後，舉行了第二次審判，以拉狄克和畢亞塔可夫爲首，另一批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爲了同一罪名，又被判刑了；不久之後，舉行第三次審判，以布哈林和賴可夫爲首，第三批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爲了同一罪名，又被判刑了；不久之後，紅軍將領，以杜哈舍夫斯基爲首，也爲了同一罪名，受軍法審判，處死了。這一切審判案中，不變地以托洛次基爲中心，爲第一被告，雖然當時托洛次基逃亡國外沒有到庭受審。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托洛次基

終於被莫斯科派遣的兇手刺殺了。

這幾次審判震動了全世界。十月革命元勳，幾乎全體變成了法西斯走狗，——這難道是可能的麼？可是檢察官起訴書中說得很有憑據。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起訴書說道：「本案偵查結果確定托洛次基曾與德國國家社會黨一個領袖談判，意圖聯合鬥爭。反對蘇聯……」後面又說道：「托洛次基所稱之協定，其原則，當彼與希特勒代表人赫斯會談時，業已擬定且通過矣。」不僅檢察官這般起訴，連被告自己，尤其畢亞塔可夫，也供認托洛次基確實與納粹黨商訂了進攻蘇聯的協定。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各國覺悟的無產階級以及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肯相信莫斯科審判案中檢察官起訴書和被告供辭是合於事實的。這些有正義感的人組織了「委員會」，以有名的哲學家約翰·杜威爲主席，來調查這些案件。「委員會」一面審問被告托洛次基，一面請蘇聯駐美國和墨西哥的官憲提出證據。那些官憲拒絕了，但托洛次基接受審問，從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至十七日共在墨西哥審問了八日。結果，「委員會」判決了：「吾人因此斷言莫斯科審判案皆係組織。吾人因此斷言托洛次基及塞道夫二人無罪。」「委員會」全部報告分印爲「托洛次基案」及「無罪」兩書，由「哈潑兄弟公司」出版。

無論誰，凡讀過這兩本書的，祇要不懷成見，都可確定莫斯科判決所根據的罪名是無中生有的，是羅織的了。可是沒有讀過這兩本書的人還很多，大多數人還是將信將疑的，還等更明白的證據。這證據來得比一般預料的還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的德國完全失敗了。納粹黨領袖，以戈林爲首，連赫斯在內，都做了階下囚，在納倫堡國際戰犯法庭受審判，德國國家權

案，連秘密的檔案在內，都交付這個法庭去使用。於是凡會關心過莫斯科審判案的人，都期待紐倫堡法庭把十年前那幾個震動世界的案件弄得水落石出。因為托洛次基和納粹訂的『協定』，若是實在的，總可以在檔案中找到蹤跡；此外，赫斯本人正在受審，法庭也可以問他呀！

於是，由於威爾斯——我們向他的在天之靈致敬——發起，英國許多文化界和政治界人物（其中有幾個國會議員）聯名函請紐倫堡法庭，『爲了歷史真相』，容許托洛次基寡妻聘律師來出庭訊問赫斯，而且若有任何文件與托洛次基和納粹領袖『陰謀』有關的，必須在法庭公佈。

接着英國之後，美國政治家，文學家，大學教授，工會運動者，約百人，以諾曼·托馬斯和馬太伏爾爲首，也聯名要求紐倫堡法庭徹查此案，雖然未曾要求容許托洛次基寡妻聘律師出庭。

托洛次基寡妻娜塔里亞·塞道瓦自己已經過她的律師阿爾伯爾·戈德曼致書紐倫堡法庭庭長羅倫斯爵士，要求出庭訊問赫斯及證人稅檢文件。律師說：『托洛次基夫人和我都認爲杜威委員會底斷案是確實無疑的，但爲了說服那些尚不信莫斯科審判案爲羅織的人，我們仍願訊問納粹戰犯，尤其赫斯，仍願要求現在管制德國諸國家在納粹檔案中尋覓任何何與所稱陰謀有關之文件。』

第四國際各國支部，由英國支部發起，比，法，荷等支部，都邀請本國社會名流聯名向紐倫堡法庭提出同一要求了。

第四國際美國支部沒有參加這個運動，因爲據牠公開的聲明，牠并非對此問題沒有興趣，而是爲了不能完全信任紐倫堡法庭。這個法庭是帝國主義法官們和蘇聯法官們所組成的，法庭行事沒有受人監督。這些法官也可以羅織大案，同莫斯科法庭法

官一般，倘若他們之間意見是一致的。赫斯和其他納粹領袖操縱在他們手裏，祇要能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審判者和被審判者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過去曾發生一件同類的事情。當大戰期間，羅斯福與史大林合作時候，美國駐蘇大使古維斯寫了一本『莫斯科使命記』，得到美國政府准許出版并攝成電影，其中就詆毀莫斯科審判案諸被告爲『納粹走狗』。

然而美國支部是過慮了的。時代不同了，帝國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如此衝突，已不能共同施行一個羅織再來沾汚老布爾雪維克派命令了。但法官們也不願顧全『歷史真相』。他們乾脆不理會威爾斯及他諸人底要求，更加不理會托洛次基寡妻律師底要求。

現在紐倫堡法庭審問終結了，各被告祇等候宣判了。但是在漫長的幾個月審判期間，檢察官（連蘇聯檢察官在內）未曾拿出一個文件，一點證據，關於『托洛次基和納粹黨的陰謀』，也未會訊問赫斯一句話，關於這個『陰謀』。蘇聯檢察官不啻是以此緘默向世人公佈：莫斯科審判案完全是羅織！這就是威爾斯先生所要的『歷史真相』，他獲得了真相而死了。聞明這真相的，除了杜威，就要數他了。他若是不朽的，則這件事情將是造成他不可的一個最大因素！

於托洛次基遇難第六週年

大戰留下的創傷

Evelyn Atwood

正當巴黎和會準備着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清帳才向世人公佈哩。

此次大戰中，人力（軍人和非軍人）損失爲：二千二百萬人死亡，三千四百萬人受傷，二千五百

萬人無家可歸，——共八千一百萬人。這種損失，用美金來估計，共值一萬萬萬萬元；城市，房屋，工廠，鐵路等損失底價值尚未計算在內。戰後，饑荒和疾病普遍於全世界。歐洲三萬萬人中，就有一半的人在饑餓線上掙扎着。德奧匈法意比南捷波希阿諸國，羣衆在餓死之中。英國，一個『勝利國』，糧食存儲又減少了，麵包採取配給制了。蘇聯，糧食底缺乏，比官方承認的更加嚴重。印度有一千五百萬人，中國有二千七百萬人，在等待餓死。

廣大區域的人口幾乎全靠善後救濟總署發給的糧食爲生，有些地方每人所得減少至九百五十卡羅里，即納粹配給布恒瓦德和貝爾森兩集中營囚犯的數額。

許多城市，一歲內嬰孩底每年死亡率爲百分之二〇。今天歐洲有後天不足的小孩子二千萬人至三千萬人，亞洲此類的小孩子還更多些。

疾病和饑荒是形影相隨的。今天，結核病和性病如火燎原。波蘭一國，死於結核病的人約有戰前四倍；大學生中，百分之二一七有活動性的結核病。性病是跟隨佔領軍來的。美軍佔領軍中，性病流行程度隨被佔領國窮困程度爲比例。駐歐美軍害梅毒和淋病的，初停戰時祇有百分之七·五，今天則增加到百分之二六了。有些國家，如挪威，雖無美國或他國佔領軍，性病仍很流行，政府仍須努力去克服牠。

在日本，美國佔領軍兵士抱怨不得復原，便酗酒，盜竊，強姦，毆打日人，來發洩憤怒。

饑餓，疾病，死亡以及道德墮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果。但是與巴黎和會所準備的未來的大戰比較起來，上述那些後果又如同小巫之見大巫了。

唐盛譯自『戰士』週報

硬殺與軟綁

木君

同在七月中旬，同一個特殊勢力，在不同的兩個地方，用了不同的兩種方法，對付了中國民主同盟的三個領袖。

人們用手槍在昆明打死了李公樸開一多，又在北平用汽車請走了孫中原。前者是硬幹的，是鐵與血的事件，所以震驚了全中國，甚至波動了全世界；後者是軟做的，是撲朔迷離的，所以不會引起同樣反響，甚至為許多人所忽視。

其實前後二者，不過是一個制度的兩種手法，一塊盾牌的兩面。「硬幹」固然可惡，「軟做」却是尤其可怕的。殺人見血是慘事，但誰能說殺人不見血不更慘些？「軟做」却是兇手彈穿進了血肉之軀，被射擊的人倒了，事情清清楚楚：一邊是卑劣無恥的兇手，另一邊是求仁得仁的烈士。人們的感情也容易安排的：痛惡殺人犯，同情犧牲者。就被害人所代表的思想事業言，一兩個人的血往往能換得來更多的代價。可是「軟做」方法的情形就不同了，也是兇手對被害人的射擊，但他所用的手槍非但無聲，而且無形。給擊中了的人並不流血，身體還是好好的，頂多不過「神經失常」，可是他一樣地倒下來了，精神上倒下來了，甚至被毀滅了。放射這支無聲無形槍的人不算兇手，而是「導師」「保姆」或「教育者」，而那個被射中的人呢？自然也不是烈士，而是「懺悔者」「改宗者」或者「叛徒」了。這時候人們的感情是如此的：不痛惡兇手，却儘情地鄙視那個被害者，連帶甚至也鄙視那個被害者所代表的思想事業。

如此說來，「軟做」不是比「硬幹」好得多，高明得多，有效得多嗎？所以實在說，硬幹早已是過時的方法了，早已不是「科學的」特務制度的正宗。有時還偶一用之者，那不過是佔着次要地位罷了，或者，濟「軟做」方法之窮而已。

我們曾經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說起過「軟做」，即「再教育」的內容，這裏要借孫中原案做個實例，讓讀者多多欣賞一下這個現代特務制度的高妙藝術。

孫中原案就報紙上的消息看，牠的發展經過如下：

一、「七月十八日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在南池子街被綁失蹤。」

二、「十九日民盟華北負責人張東蓀，劉清揚聯名致函李主任，熊市長，要求營救孫中原。」

三、「二十九日，『據政府高級官員二十七日告合衆社記者稱，孫中原失蹤一案，實係其本人主動，孫氏現由政府保護監視。因渠最近曾作反共言論，深

恐共黨加以不利，故請求政府予以保護……又稱：孫氏現患神經失常症，正由醫士診視中，據渠告醫士稱，渠渴望與政治絕緣，俾專心辦理實業。」

四、卅一日申報駐平記者電：「報載孫中原刻在東城什坊院五十四號休息，記者今日上午十時按址去找，見一位穿黃卡基褲的中年人出來開門，要求見孫中原，他說：『孫先生洗澡去了』，問何時回來，答：『孫先生還要去看病』，問害的什麼病，說是腸胃病。據說這個地方不是孫中原的家，而是他的朋友的住處，問這個朋友姓什麼，那位先生說不知道。」

五、同日據中央社記者說，他曾晤及孫中原，據說孫中原「身體頗健」，又說他並未被捕，實係「七月十八日行至東安門附近，忽遇十年未見老友寶世來，於傾談時突然病發暈倒，乃由其友送往什坊院五十四號自宅。」

六、同日，北平世界日報公佈一封孫中原給李主任的信，說：「因病後苦惱，復因家事萬端，一時氣憤，避居友人家中療養……願於近期返籍，今後繼續實業，決不作非法行為……」

七、八月一日，「孫中原專機飛西安轉蓉，行前留書張東蓀，聲明退出民盟，並指民盟為『共黨尾巴』。」

八、同日據文匯報訊：「聞孫中原已於一日晨避居西苑某處，對外宣傳則為返回成都，并自即日起脫離民盟。」

九、八月五日，「民盟華北支部負責人張東蓀藉特電蔣主席，要求保護孫氏安全……請電令川省當局邀集各黨派無黨派人士證明其確為安全與自由……」

十、八月二十日，文匯報南京電，「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自失去自由後，正被監視於成都孫氏私宅，傳曾受刑，已手足麻木，不能行動。生命安全殊為可慮。」

僅僅上面摘引的一些公開消息，已經達到了自相矛盾的極致：忽爾「自請政府保護」，忽爾「遇見十年未見老友，由其送往自宅休息」，又忽爾是「一時氣憤，避居友人家中」。一個申報的記者說他「患病去看醫生」，同一天的中央社記者却見他「身體頗健」。更可笑的，孫中原既然「自動」到朋友家去養了幾天病，為什麼要寫信給「李主任」表示「今後決不作非法行為」？更為什麼要煩勞行營用「專機」將此「病人」送赴成都？這種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宣傳，真所謂是欲蓋彌彰。

美國的新聞記者見了這些前後的報道弄得莫明其妙，祇能說是『謎』，也是中國式特有的謎，其實這何嘗是謎呢？拆穿『西洋鏡』，特務制度這『無形手鎗』在作祟吧了。

我們沒有興趣從這消息中細找矛盾，藉以揭破牠們的虛偽與欺騙。我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些矛盾太清楚，毋需乎找。我們也毋需採取法學家或實證主義者的態度，從這些矛盾中找『證據』，藉以證明這個『事件』究竟是誰幹的。我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在最近一二十年出成千成萬『孫中原』用生命來證明了的事，再不必找什麼證據了。我們可以斷定，憑事件的本身就可以斷定，這是中國現統治者所直轄的特務機關的傑作。

我們感興趣的是下面這個問題：

特務機關究竟用什麼方法完成牠的傑作？牠有什麼法術，能使一個政敵在短短幾日內『神經失常』，『灰心政治』，『認罪悔過』，『留書退盟』，並且『專機回籍』呢？

我們知道，特務的第一步是所謂『調查統計』，那就是尾隨，釘梢，綁架，無論對於什麼人，根據一個密告或簡密被特務認為形迹可疑，就放一只『眼睛』在他身上，調查他的關係，記錄他的往來，然後等一個時期，當特務們認為『統計』已經完畢時，就來一個『一網打盡』，把全數被『調查』到的人就統牽了來（有時也有祇牽一個的）。牽的時候是秘密的，『行動』的人不穿制服，不佩證章，不拿拘票，不說明機關，就這麼簡單地將你『幹』去了。

第二步是審問，即所謂『疲勞審問』，或者所謂『輪番審問』。『幹』了來的人立刻有人跟你『談話』，調着班談，每班一人或二三人，每班延長二三十小時，一班接着班，不讓你片刻休息。用種種問題：從你的家談到國事，從組織談到理論；用種種方法：從利誘到威嚇，從欺騙到硬敲，從送煙送茶吃大菜一直到老虎凳，荷蘭水，三上吊；用種種角色：從朋友親人似的『好好先生』一直到滿臉殺氣的打手；：這樣地談話，這樣地審問，毫不間斷地，從早晨到晚上，從黑夜到黎明，六小時，十二小時，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九十六小時；：總之，一直跟你談過去，纏下去，他們是以逸待勞，輪番出戰，有似『牛頭山』上滾下來的『滑車』，而你呢，給弄得心力交瘁，疲憊難支，感覺痲痺，神經破裂，最後如果不是發瘋瘋來，一定會萬事灰心，任人壓榨，有似那個被碾死的『高龍』。

被如此審問的『犯人』，很多會在第一個『遭遇戰』中就完全敗下陣來的，他繳出了武器，滿足了人們的要求：『招供機關』與『登報悔過』。

但也有許多人熬下來了，那末暫時把你『優待』起來（把你絕對地孤立起來，使你同家屬，同外界，甚至同相等的犯人，更甚至同任何書本隔離），特務們一方面對外散播你『投降』的謠言，另一方面隔一個相當日子，再來『疲勞』你一次，或叫你出去，毫沒來由地，弄幾個粗小子狠狠地揍你一頓，接着又是『優待』，又是孤寂。如此下去，一月不成則二月，二月不成則四月甚至一年，二年，……最後總有一天解除你精神上的末道防線。如果你這樣還不倒下來，那末會有一天，往往是夜間，請你出去，花費一顆『國家』的子彈！沒有罪狀，沒有宣判，自然毋需乎通知家屬，你便從此『失蹤』了。

孫中原大概在第一次『疲勞』中就『神經失常』，就『悔過認罪』，就『留書退盟』的；不過更可能，孫中原還不會『倒下』，他致『李主任』與張東蓀的書信都是特務偽造的，所以還不讓他自由，還要『專機押解』赴蓉。孫中原事件是一個例，一個小小的例；但是特務們的全盤的面目已可以看出來了。這是多麼的惡毒，陰險，『違反人道』與『侮辱理性』呀，但牠偏偏是『禮義廉恥』的真實內容！

人們在董季公樸與聞一多的慘死，提出了抗議，舉行了追悼，並且要求徹查；對於孫中原事件却淡淡地讓牠過去了，除了張東蓀的一個電報之外，我們不見有任何抗議與評論。其實這是錯的。

反對特務，首先要反對那『軟做』的特務！

提審法的嚴格實行，人身的切實保障，一切政黨合法存在，一切罪犯必須由法院審理，這是我們必須以自己的力量首先加以爭取的。

不過在為反對特務而從事鬥爭的時候，我們不願人們陷入一種錯誤的見解，彷彿特務制度只是現當局中幾個反動的『頑固分子』所發明所主持的，只叫去掉了這幾個人，就可以根絕特務了。這是一種錯誤。

中國的特務制度非但不是某幾個『頑固分子』所創造，甚至還不是本國自造的。特務制度這門『科學』，與其他的一切科學一樣，是從外國學來的。從納粹的德國，從法西斯的意大利，甚至從墮落以後的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我們的執政黨學來了；不過抄襲加上了獨創，舶來的加上了中國古有的，以致一二十年來，中國的一切科學遭到了摧殘，萎縮着，奄奄無生氣，唯有這門特務與警察的『科學』，發揚光大着，冷中西文明於一爐，竟是青出於藍了。

發生特務制度的社會基礎是不同的。德意的特務制建築在腐朽反動的資本主義身上，而目前蘇聯的特務則為了那墮落了的工作人國家的官僚階級的利益。但牠們乃是社會矛盾達到了最尖銳，被壓下去的革命尚在威脅，統治階級對下層羣

衆十分恐懼時候的產物，却是一樣。

中國大資產階級在二十年前利用了羣衆的革命，中途又屠殺了羣衆，出賣了革命，因而獲得了政權。這種情形使他和廣大羣衆始終立於最不可調和的地位，使他自己始終陷於矛盾威脅與恐懼之中，因而使牠向外國去輸入了特務制度這一「科學」。

既然中國統治階級存在的條件決定了「特務制度」的存在，那末想從現統治的機構中單獨挖去這個特務制度，可見是絕不可能的。統治階級與特務制度是「共存共榮」「同生共死」的，牠祇能在一種情形下倒台，即是統治階級整個倒台的時候。牠不能用改良方法來除去，祇能用革命方法來推倒。

論者

一篇值得學習的

哀悼文

守敬

在道亂時代，人的死亡好像也比平時更加頻繁。才聽說這位名人去世，又聽說那位領袖被殺。當一位名人或某派領袖死亡的消息傳出，照例要有「一番宣傳烘染，贊揚死者操守如何堅定，人格如何高尚，學識如何淵博，風度如何可欽，幾乎成了一種風氣。本是不相識的，也必須前去弔祭，以表示自己已與名人領袖會有往還；本是不悲痛的，也必須作詩作誄，以表示自己確有哀思。

死的人的名氣愈大，排場也就愈熱鬧，收到的輓詩輓聯和其他紀念文字也就愈多。有時由報紙披露了出來，可以占滿篇幅。其中雖無由衷之作，但大都帶有應酬意味，讀之能發人感觸者極少。我的經驗既如是，所以一向對於這類文字總是不願多看。看也大致只看看死者的生平而已。

但是奇怪得很。最近於無意中我却讀到了一篇極好的哀悼文章，那就是本刊前期的「敬悼陶行知

論「中間派」(上)

由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便有一部分人感覺到國共兩黨所走的都不是路，他們想尋找一條中間道兒。他們想找一條既不與資產階級與地主的，也不是工人與貧農的，他們要一條首先代表「全體農民」與廣大小生產者的利益的，這企圖產生鄧演達的第三黨，這是中國此番革命中最早的「中間派」。

結果，如大家所熟知，第三黨並沒有什麼發展。鄧演達死後，有幾個領袖回到國民黨去做官了，有幾個堅持着的，便躲在香港做亡命客，跟中國的實際政治，甚至跟中國的任何一部分羣衆，都脫離了關係。第三黨道路沒有走成，走不成的緣故倒不是因為此路不通，而是因為這條道路實際上給中國共產黨走去了。中國共產黨自從最後在武漢，接着又在廣州失敗之後，不久便把工作與努力的中心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從工人轉向到農民。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脫離了城市與工人，全力從事於農民的軍事鬥爭之後，事實上牠已經從工人革命的路轉入了農民革命的路，從一向的左邊道路轉進了中間道路，從馬克思主義的（雖然

是應用得錯誤的）道路走上了鄧演達的道路。

第三黨在組織上是失敗的，但在政治上却成功了。中國共產黨繼承了牠的路線。至於共產黨呢？組織上成功了，政治上却是失敗的，中國共產主義的工人運動從一九三〇年以來，簡直已不再存在。祇有極少數從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托洛次基主義者支撐着這面旗幟。中國托派在組織上的可憐比第三黨祇好得一點。

此種表現於政治派別上的興衰榮辱，完全反映着中國革命失敗以來國內諸階級關係的變化，牠反映着中國無產階級之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地主之不穩定的統治，又反映着農民大眾在反革命統治下的繼續抗爭。任何一個政派的命運，總不能不分享着牠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共同命運的。

過去中國二十年的歷史，主要是一方面資產階級與地主，和另一方面農民之間的爭鬥，表現在組織上，便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那一段歷史是沉悶，糾結與無出路的。為什麼無出路呢？因為，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其出生的歷史條件使然，她對外和帝國主義相結託，對外和封建殘餘的地主勢力相聯合，不能徹底解決（甚至不能部分解決）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土地問題與民族獨立問題，因此她就沒有希望爭取廣大農民到自己方面來。另一方面，農民，在內部階級分化與缺乏城市無產階級政治領導的情形下，無法成功一個決定的獨立的力量，去推翻資產階級與地主的統治，結果，形成了「誰也解決不了誰」的局勢，形成了無出路的「拖」。

必須有個第三力量出來才行呢，人們從來就這樣感覺着。

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上海抗日戰爭與不久之後的福建「人民政府」，都是第三種人的嘗試，但因事情祇限於少數上層軍人，結果祇曇花一現罷了。

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形有了改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愈加兇暴，「甯贈友邦不爭家奴」的當局態度更加明顯；同時，那時候中國的經濟來了一次相當可觀的轉機，這適合首先使得

先生」一文。這篇文章雖和普通的弔文迥然不同，主讚揚中含着批評，然而却正因為這個原故，能够表現了弔文作者的真誠，非普通一味讚揚的浮汎可比，由批評的嚴肅，才能反映出讚揚的有力。當我讀到該文歷歷敘述杜威同情被壓迫者的事跡，來襯托陶行知先生始終同情被壓迫者的精神那一段，我感動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了。

從思想一點來說，杜威，陶行知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是南轅北轍；就是從行動上來講，像王若飛葉挺秦博古諸志士的一生為革命奮鬥的事跡，也應該更能使我感動。可是人們追悼王葉秦諸志士死難的文字中，我卻沒有遇着一篇能够像這樣使我感動的。這是什麼原故呢？一個字：『誠』。惟『誠』可以動人。我想到三國演義上孔明哭周瑜的故事。東吳的將士看見孔明哭周瑜哭得那樣哀慟，不由得也隨着啼噓起來，心裏甚至對於平時聽到的『孔明和周瑜不和』的謠言也懷疑起來。孔明雖為周瑜所忌，但是最能識得周瑜的却仍是孔明。爲了惋惜周瑜這樣的傑出人才早世，爲了想到滅曹操，重興漢室的責任艱巨，而如今失去了最有能力的同盟者，孔明的哀慟不但不是虛偽，而且超乎尋常。孔明的真誠態度不但能感動當時的在側者，他那篇祭文甚至能在兩千年後的讀者心弦上引起共鳴。

我記得當王葉秦諸志士遇難的時候，新華日報曾刊載某有名文學家的輓詩，在相並的地位又登載同一文學家的感懷詩二首。那感懷詩尙可一讀，但那輓詩却毫無意義，因爲那既無真實的感情，就要說是字句的堆砌。三男君悼陶行知先生的文章，雖對陶行知做了嚴肅的批評，但惟有這篇文章却真正指出了陶先生的精神可貴處。看哪，你看他怎樣在嘆息杜威的中國門徒一時非常之多而真正足稱爲杜威傳人的只有陶先生一人啊！

城市的一部分中小資產階級，學生，一部分的工人，又踏進了政治舞台。他們以第三者姿態出現了，組織在救國會中。這可以說是中國二十年來第二次出現的相當可觀的『中間派』。

抗戰發生，在初期的民衆與奮與國民黨軍政統治的一時鬆弛之下，各個小黨派都相當活躍起來了。牠們在表面上都獲得了『合法存在』。但因國共二黨在抗戰口號之下的聯合，國民黨因抗日而獲得了比較廣大的民衆擁護，共產黨則因放棄階級鬥爭而蒙受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嘉許。在此情況下，『中間派』的社會基礎簡直愈弄愈小了，以後這些派別雖然露了面，而聲勢（如救國會）却反而比戰前更小。這原是自然的，牠們的存在是為了促成抗戰，既『抗戰』了，他們便祇留着擁護的分兒了。

『中間派』的抬頭還要等到抗戰後期。那時候，國民黨完全投靠在美國懷裏，國共關係復趨惡化，抗戰初期的民衆偽飾全被拋棄，戰爭的反動性質愈加暴露，過重的與不平等的戰爭負擔，激起了極其廣大的一層民衆，尤其是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羣衆，對國民黨政府極度不滿。這個新的環境刺激着國共以外的諸小政黨，使他們組成了『民主同盟』，形成了一個規模比從來更大的『中間派』。

勝利以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貪婪無恥，『復員』機關的橫暴反動，『四強之一』之兌現爲斐列濱第二，『和平』美夢之化成爲殘酷的內戰，再加上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飢荒遍地，貪污橫行，而政府則一味對外諂媚，對內高壓，沒有一個改善的辦法，也絲毫沒有改善的企圖。這些情形，使得更多的人，甚至大資產階級中的某些部分，也都對國民黨政府不滿起來，附和着民主的呼聲。於是中間派的民主同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並且，類似性質的團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爭和平大同盟……等等，竟像雨後春筍似地發生出來了。中間派的政治運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代。

社會基礎

既然中間派是這樣一個歷史的結果，是中國目前政治形勢的客觀產物，牠存在着，同時起着作用，那末對牠漠視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研究這中間派，研究其立場，其作用及其前途，然後對牠採取一個正確的態度。

從何着手呢？從牠的基礎。不過在上面的歷史說明中，我們已約略提到過這個基礎，那便是介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工人貧農之間人數衆多的中等階層。如果歷舉出來，便如施復亮先生（一位中間派的理論家）所說的：『民族企業家，手工業者，小商人，工商業從業員，知識份子，小地主，富農，中農（自耕農及一部分佃農）』（見七月十四日文匯報『何謂中間派？』）。我們不想討論是否這些人物構成了中間派的社會基礎；但要研究在中國目前的政黨關係與階級關係中，這些人物能否造成一個中間性的堅強的政治組織。

要做這樣的研究首先讓我們看看國共兩黨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國民黨代表什麼階級？這問題乃二十年來中國政治上與理論上的聚訟之的。對這問題的答覆，以及由種種答覆所作出的政策，關係着中國的政治，以至相當決定了中國的最近史。當二十年前，中國國民黨還祇局限於廣州一隅，共產黨正想和牠合作革命的時候，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初次爲這問題發生了爭論。一方

回想起幾年前我在某中校教國文，課本中選了胡適之翻譯的一篇杜威的演講。表面上看來真可謂演講得頭頭是道，層層有理。我照着杜威的意思把這篇演講講解了之後，問學生看出什麼破綻沒有。杜威的思想連大學生大學教授也要受它麻醉，怎會讓中學生看出破綻來？大家當然說毫無破綻，於是

我陸續把那篇演講中破綻指出來讓學生重新思索，他們才了然於實驗哲學的經驗真理的狹隘膚淺不可靠。又回想起幾年前我偶然有一次和陶行知接談的機會，陶先生給了我一點不好的印象，使我覺得他有點固執。本來杜威的教育法是要用啓示方法就實際經驗來訓練學生使用自己的頭腦，好讓直接認識真理。抱這樣主義的人照理是會十分謙虛的，何以會給人以頑固自是的印象呢？問題關鍵大概也正由於他先存了『唯經驗可靠』的信念。我們討論一個問題，我表示這個問題需要研究改良的地方仍很多，陶先生却以為既已有了方案，只要拿去實用就得，看在實用中有無毛病，學理上的研究是多餘的。啊，這不是實驗主義的頑固嗎！（也許因為陶先生具有樸素的性格，說話了截，使我誤會了他。）

照這樣，杜威和陶行知的思想既和我的思想不同，何以三男君的悼文會使我非常感動呢？那就是由作者沒有因為杜陶兩先生的思想錯誤而掩沒杜陶兩人中最可寶貴的素質。儘管杜威主義始終反對階級革命的必然和必要，但他能由人道主義起見對階級壓迫人的狀況，反對戰爭的殘酷。儘管他和托洛次基有意見上的紛歧，但他一旦覺得俄國清黨案有陰謀殺害的嫌疑，却敢挺身出來調查該事件之真實情形，不願有為羣蜂圍擊的危險。陶行知先生的為人，正如他改名『知行』為『行知』一事所示，也着重本着自己的認識去實行。儘管他的教育理論未必正確，小先生制未必能夠達到掃除文盲普及教育

面，以史大林為首，認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的四階級聯盟』，另一方面，以托洛次基為首，則以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牠和世界上所有的資產階級政黨一樣，是包含許多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聚的。前一見解在第三國際中佔了上風，因此也成了中共的正式見解。將這見解實行出來，便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服從其紀律，信奉其主義，聽從其指揮，結果，大家知道，共產主義者及工農大眾拚死拚活，流血流汗，將這『四階級聯盟』捧上了政權之後，資產階級一黨獨裁的猙獰面目就立刻顯出來了，將其他的『三階級』殺倒在血泊之中。

資產階級經過國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問題到此原已解決了，但人們還是以新的方式爭論着。史大林及其中國的從者說：國民黨代表『封建殘餘』，『四階級聯盟』一跳到政權却變成了『封建殘餘』，真是聞所未聞！不過他們也自有一說的，他們說國民黨執政是表示着資產階級之叛變革命與對封建殘餘的投降，故勝利後的國民黨變成『封建殘餘』了。

托洛次基及其中國一派的意見認為：國民黨資產階級與軍閥地主的妥協，並不能表示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封建化』或地主化，在目前這個時代與環境中，地主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祇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地主，所以任何資產階級與地主的聯合政權，祇能說是資產階級的。

根據前一見解，國民黨雖然反動了，但中國資產階級仍舊革命的，或仍舊可以革命的；但據後一見解，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就整個階級來說，已經隨國民黨的反動而反動了，牠再不能起任何真實的作用，來促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解決了。

江西五年，中共的全盤努力就是要靠農民力量打倒國民黨的『封建殘餘』。抗戰八年，中共所採取的一切政策（聯合戰線與階級合作），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則根據於『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一個認識，兩種應用，而結果則都是加深革命的勢力，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

抗戰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二大變化。第一財富劇地集中在極少數官僚的資本家的手中，他們把持了全部金融機關，由此控制了國家的整個經濟命脈；第二，世界財政資本，亦即美國的財政資本，更加深入地打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使中國的金融資本成為牠的一環，成為牠在中國的代理人。

這時候，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性應該是更清楚了。誰知又不然，中共及全體民主派都說：牠代表『封建地主，買辦，官僚』，如此國民黨更不代表資產階級了。因為依照他們的意思，祇有『民族資產階級』才是資產階級，買辦官僚是屬於另一範疇的。但是我們知道，在目前中國，不懂買辦與官僚，便是那些大地主，也都是金融資產階級一身兼做的。所以是金融資本兼併着土地，經營着進出口，霸佔着官位；是金融資本操縱着中國的經濟，控制着中國的政治，構成了國民黨的主要的社會基礎。難道金融資本家不屬於資產階級嗎？難道我們能說國民黨是一個『封建的』政黨嗎？按照抽象的理論說，『我們的』金融資產階級誠然不是『民族資產階級』。但我們要問：中國有多少民族資產階級不帶有買辦性的？有幾個『民族資本家』不在尋找官僚資本的合作？有幾個『民族企業家』能對金融資產階級獨立起來？簡直沒有，即使有，也是鳳毛麟角。

在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時代，官僚的獨佔資本之排擠自由的民間企業是一個普遍的事實，是註定了的

的目的（教育的普及與否首先與社會制度有莫大關係），但是他却始終照着自己的認識努力不懈。他雖未能徹底了解中國社會癥結所在，但對於認為不滿的却敢說敢道，屢觸當局忌諱。

由於三男君的文章，我聯想到目前流行的捧場風氣。如果計文哀啓盡符事實，則社會上可謂無一壞人。但是誰都知道計文哀啓不可盡信。不幸計文哀啓的作風竟從家庭走向社會，從普通社會走到『前進』集團。不僅死了的個個好，就是活着的，凡與吾攜手者，莫不為全人。對名人則極力讚揚褒美，對領袖則同聲附和追隨。革命份子既失去批判精神，則改革力量就必然大大降低。就拿陶行知先生來說，陶先生雖然指出現行教育制度中許多缺點，嘆息教育不能普及，窮人不能讀書，但他始終沒有明確指出教育所以不能普及是由於社會制度使然，反而過分高調『小先生制度』的功效，社會大學的優點，使人們幻想在現社會制度下靠『小先生制度』和『社會大學』能够把教育辦好。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在這點上自然是有毛病的。但因他是『民主』戰士，於是一切的一切都變成無可非議的了。

思想的檢討和批評既然如此鬆懈，無怪一切不同傾向的思想會弄得混濁不分。經驗論會不知不覺代替了辯證的唯物論。舉例來說罷，最有名左傾文學家郭沫若先生，最時髦的左傾哲學家艾思奇先生乃至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在一切機會都要大談『向羣衆學習』，却少談如何教育羣衆，如何提高羣衆理論水準。在他們看來，只有羣衆由實際得來的經驗才可靠，至於書本上的理論探討都是空談。他們忘記了羣衆的經驗往往有局限性，表面性，不經過科學方法的分析檢討，是難免要包含錯誤的。我們如果談論理論研究，一味強調向羣衆學習，結果必然會做了羣衆的尾巴。最近我碰見幾個中共系

命運，我們不能叫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回來，也不能叫殖民地的中國自外於壟斷資本的兼併過程，這個過程以其殖民地的特有方式在中國完成着；本國金融資產階級以世界財政資本的代理人資格，鯨吞着小企業，集中着全部財富，施展着反動的經濟行為，實行着野蠻的政治壓迫。

這樣的資產階級當然是反動的，但『實逼處此』，中國却不能有一個較不反動的資產階級了，因之，也不能有一個較國民黨更不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了。中小規模的工商業者，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縱使對金融資產階級懷着千般幽怨，也只得屈辱承歡的。縱令有一時期的反抗，但一遇到緊要關頭，即遇到有關於資產階級與農工農大眾的利益衝突時候，牠便立即拜倒在官僚買辦的金融資產階級前面，團集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了。

這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已經表現了太多次數，以致我們不再相信目前的中間派能造出一個奇蹟，把『民族資產階級』的天生軟弱病醫好，讓他們在『地主官僚買辦』及其政黨面前始終直立不屈。

現在讓我們來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對於這問題，中間派的施復亮先生給了我們一半的答覆：『牠始終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言外之音，施先生對於這個『自命』未能盡同，但又不說明異見。究竟共產黨的『自命』是否與事實相符？我們得自己來研究一番。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確實可稱得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雖然大部分的領導者是知識份子，雖然牠的政策犯着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但就其羣衆基礎，政治意識，政策傾向，以及主要的行動說，牠之代表無產階級利益是不可否認的。

革命失敗後，正如我們上面所說，共產黨實際上是逐漸離開工人，走向農民了，等到牠轉到陝北，提出聯合戰線，標榜新民主主義以後，共產黨實際上已公開否認了自己是『階級的政黨』。毛澤東和施復亮的見解一樣，認為中國是『橄欖形的社會，兩頭尖而中間粗的』，共產黨就是要代表這個廣大的中間層的，所以牠拋棄了階級鬥爭，提倡階級合作，放棄革命，主張改良，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努力要發展私人的民族的資本主義。共產黨和施復亮先生一樣，把自己的政策緊緊地扣住在『民族企業家』；『小地主，富農，中農』身上，緊緊地扣住在這中間派身上，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爭取了普遍的同情，甚至還得到了美國自由派記者與中國一部分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嘉獎；同時也正因此，牠失去了所以為共產黨的基礎——無產階級與廣大貧農。

中國共產黨今天的階級基礎是以股置的自耕農為主，『兼顧』着佃貧農與小地主雙方的利益，同時又以改良政綱吸引住小商人，手工業者知識份子等類人物，甚至還企圖吸引『民族企業家』。這個階級基礎恰恰就是施復亮先生所說的廣大的中間階層，也正是牠造成了施先生所說，共產黨的『優點與弱點』。如此說來，中間派自以為可能擁有的社會基礎，原來最上層傾向於國民黨，中下層趨附於共產黨，中間派終於會懸掛在半空中的。

『中國革命悲劇』譯稿未到，暫停一期。從下期起接發第三章『新覺醒』。對於留心中國第二次革命歷史的讀者，我們敬致歉忱。

編輯部

選舉和示威 (法國通訊)

朱海聲

統的人，問他們國民黨明明毫無談判誠意，何以共方看不出來，却盡量在委屈求全。他們給我的回答是『因爲人民一致希望和平』。中國人民一致希望和平，確是事實，但是向國民黨委屈求全是否就可以給人民以和平呢？事實告訴我們，中共愈委屈求全，愈優柔不決，國民黨就氣焰愈高，反動愈甚，和平愈無希望。這就是做民衆尾巴的結果。

其實中共精神上的腐化，早已不是思想檢討鬆懈了。官僚化和缺乏思想檢討互爲因果，在中共內部甚至造成最壞的虛偽現象。不但欺騙別人，甚至欺騙自己。其原因仍不外無勇氣正視現實，只一味盲從領袖。領袖未嘗者不敢言，領袖已道者始敢道，領袖所警者吾不可以加毀，領袖所排擊者吾不可以親近。一句話，連自己也不相信，但爲了宣傳却必須拿去騙人。一句話，連自己也沒有弄清，但因爲人家說它合乎『辯證法』只得依樣葫蘆。例如中共的失守長春明明是由於力不能保，偏有人要說是爲謀大局和平自動放棄。前些年紅軍自江西突圍出走，明明是因爲實力懸殊太甚，不得不放棄老巢，以謀保存一部分武力，偏有人要說是『以退爲進』，好像說『以退爲進』就合乎辯證法則，說不得已放棄老巢就太俗惡。俗雖俗，却比那玄虛的『以退爲進』更能道出事實，革命家如果不敢正視現實決不會走上勝利道路的。

記者按，守敬先生投來這篇文章雖然稱讚社友三男君前期悼陶行知先生一文，說讀了其中一段，『感動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們仍不避溢美之嫌把來發表了，因爲文章後面從陶先生底實驗主義談到了中共現在的哲學，我們認爲是很有見地的。我們主張以真名稱呼實物，我們注重正視和理解，守敬先生此文內所說的一切，我們都可同意的。

記者按，巴黎此時正在開和會，正成爲世界新聞的中心，我們恰好接到朱海聲先生從那裏寄來的通信，其中雖然未曾提起和會的事情，因爲是在和會召開以前一個月寫的，可是所說的六月間的二件大事，其重要性即使不超過和會，也是與和會相等的。朱海聲先生很正確指出這個歷史上模範的革命之國可能再掀起一次大革命，他便是以此觀點來分析那二件大事。讀者請勿以明日黃花視之。

到巴黎後觀察法國局勢，覺得是很緊張的。各階級都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政治興趣，都在討論着法國應走甚麼道路，都漸漸有了決心，爲自己的政治主張，或甯可說，爲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參加實際的鬥爭。這個局勢，雖不能還稱爲革命局勢，也離開革命不遠了。

千頭萬緒從何處說起呢？我想拿最近一個月內發生的兩件大事做中心，說一說法國階級鬥爭的現象。這就是本月二日的全國制憲會議選舉和本月二十日的巴黎工人示威。

制憲會議選舉結果，你們早已從通信社報告知道了；各黨所得票數百分比，你們也應當知道的。這些，我都不說了。我要說的是各方面關於選舉結果的估量。

『人民共和運動』(M.R.P.) (這是戰爭發生後才有的黨) 以及一般右派都誇耀勝利，因爲這個黨經此選舉從第三黨一躍而至第一黨地位了，在上次的制憲會議中佔第一黨地位的共產黨則退居於第二黨。『人民共和運動』領袖，即外交部長比多爾 (Bidault)，代替社會黨古盎 (Gouin)，做了臨時總統。不僅法國資產階級理，據此間報紙轉載的英美諸國言論也是這般看法的。『人民共和運動』是天主教黨，同日意大利選舉恰好也是天主教黨得了勝利，佔了第一黨位置，於是人們把荷蘭，比利時，甚至西葡二國天主教黨所佔位置聯繫來看，遂覺得這個勝利帶有國際性，至少是西歐諸國所共同的。

但法國共產黨并不自承失敗，『人道報』根據共產黨所得選票的絕對數，便說：擁護共產黨的選民，比上次選舉時增加不少了。這證明舊時選舉共產黨的人并未會因失望而離開，如右派報紙所說的，反而有新的工人走來擁護。

我的觀察則不同。我們對於議會制度并無幻想，但亦不像無政府黨人或工團主義者那樣把議會看作一文不值。議會中黨派，力量的對比固然不能忠實反映議會外真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但在社會危機期間，每次議會選舉各黨票數的消長是極富於象徵意義的。法國自從逐出希特勒軍隊以後，連此次共舉行過三次全國性的選舉了。試拿這三次選舉票數及其百分比來研究一下。但須說明的，即下表中，我們不是以黨派爲單位的，而是以各黨派所代表的階級爲單位的。我們把社會黨 (P.S.) 和共產黨 (P.C.) 看做屬於無產階級營壘的黨派，把人民共和運動及其他右傾各黨則看做屬於資產階級反動營壘的黨派。表中票數和百分比都是同一營壘各黨派所得之總和：

讀者
通信

無產階級領導

革命

華世明

編輯先生：

看到了新旗，我不禁有幾句話要說。不過我的政治經濟常識很缺乏，我的話祇是一些直覺吧了。我覺得新旗有兩點與人不問：

(一)一般刊物(反動派的當然除外)，抨擊現實，太偏於感情，新旗抱有『不要哭，不要哭，只要理解』的信條；

(二)一般刊物漫罵一通後，便無下文，令人沈悶，新旗則會指示人們一條路走。

不過對於新旗的基本態度，我却有一點懷疑。我覺得牠太偏重工人了，牠在任何問題上都着重地指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但據我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知識上不及學生，在數量上大大的不及農民，為什麼祇有牠才配領導民主運動和革命運動呢？我的知識很淺，問的問題很幼稚，但我自己和許多朋友確實有這個疑問，所以提出來請你答覆。

世明先生：

華世明上 七月廿八日

來信所說的兩點感想，自然使我們高興。

我們不想說新旗比一般進步刊物好，不過我們對目前現狀不願簡單作感情的漫罵，必須處處企圖理解，尋求根由，藉以得出正確的法，那倒是實在的。我們認為感情不是壞東西，但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理解上才有用，同時正確的理解，又必須跟隨着正確的法才有結果。我們與感傷主義無緣，我們與架空的研究無緣。目前的一般進步刊物，大多數是民主派的，民

選舉	社會黨和共產黨共得票數及其百分比	人民共和運動及其他反動黨派所得票數及其百分比
第一次制憲會議選舉 (一九四五年十月)	九, 五〇六, 一七三 49.5%	九, 五九九, 九五〇 50%
全民投票表決憲法 (一九四六年五月)	九, 二八〇, 三八六 47.09%	一〇, 四五〇, 八八三 52.64%
第二次制憲會議選舉 (一九四六年六月)	九, 三三七, 九八七 47.03%	一〇, 四二七, 三四三 52.52%

從上表可以看出兩個工人政黨總票數是第一次最多，以後都少了些。但從百分比看來少得明顯些；九個月前佔百分之四九·五，九個月後僅佔百分之四七了。不錯，單拿共產黨來看，票數和百分比都有相當增加的，所以『人道報』能誇耀他們的勝利。可是共產黨增加的票數主要是奪自社會黨的，其次是得自那些剛加入政治舞台的落後階層。法國一向有名的落後省份，如汪德省，加爾瓦多省，戈杜諾省，伊爾與維爾省，曼因與洛亞省等等，共產黨票數都有增加。但他方面，塞納省和巴黎若干市區，連『紅色地帶』在內，共產黨損失了不少的票數；北方曠區，里昂，洛亞，龍河口及其他無產階級有力地區，共產黨票數也祇有減少而沒有增加的。反之，資產階級營壘則票數和百分比都漸漸增加。不僅過去投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票的，改投這些右黨的票，而且新加入政治舞台的落後農民區域也大多投他們的票。

法國資產階級黨派政治勢力底加強可以從『人民共和運動』增長底迅速看得出來。一九四五年九月各地方參議會選舉時，全體三千席中牠祇能獲得二百三十四席，即不到百分之二五；可是同年十月，制憲會議五百八十五個議員中，牠已獲得一百四十三人，即差不多百分之二五了。(社會黨和共產黨議員則合共二百九十九人，即過半數以上。)九個月後，『人民共和運動』就代替共產黨為全國第一大黨，得到將近六百萬的選舉票和一百六十多個議員。

為甚麼這兩個營壘(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會如此變化而不利于無產階級的呢？主要是因為社會黨和共產黨領導錯誤，辜負了工人以及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之期望。法國經過慘敗之後，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都破產了，不懂工人，連小資產階級羣眾都不信任資產階級領導，借英美軍隊回來『解放』法國的戴高樂，在國內羣眾之中并非廣大而堅固的基礎。城市小資產階級於解放初時或者抱觀望態度，或者積極站在工人方面，因為工人有兩個強大的政黨，又有一個『總工會』(C.G.T.)，其中組織了五百萬工人。小資產階級投票選舉工人政黨，使之在制憲會議中佔據多數地位，使共產黨為全國第一大黨，使社會黨為第二大黨。可是這二黨得着勝利之後做些甚麼呢？牠們做的不是革命，不是改變法國現存的社會制度，而是要維持這個社會制度。牠們未曾提出一個超出資本主義範圍外的要求。事實上，法國共產黨是最堅決主張恢復法國資本主義秩序的，而法國社會黨則盡其可能襄助牠。感謝牠們共同的政策，法國資產

主派的特徵之一是不懂得社會的生理學與病理學，換句話說，他們不能或不願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所以他們雖然大聲疾呼，揮擊現實，但他們所反對的時常祇是一鱗一爪的壞現象，祇是感覺到疾病時候的一些呻吟，却不能找到病源，不能下藥治療，所以他們的論調常是感情的與呼喊的，而非理智的與分析的。民主派的第二個特徵是他們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作基礎的，因此，他們和目前的統治階級，即在朝的金融買辦資產階級與地主們有很多血脈相通之處，也因此，他們除了攻擊不民主與要求民主的呼喊之外，不能進一步提出真正有力和有效的鬥爭辦法來，即不能提出徹底的階級鬥爭的辦法來。

我們所以能堅持『只有理解』的信條，因為我們接受現代最進步一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所以能『指示人們一條路走』，因為我們是工人階級與同情工人階級分子的一個團體，所以能無所顧忌地指出鬥爭的方法。

不過話雖如此，在目前這階段上，即使像民主派的感情的呼喊也是需要的，因為廣大的民衆會在他們的呼喊中醒來，會由此去企圖理解，更由此去尋找辦法。

關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問題，新旗上差不多在任何文章與任何地方都說到的，專門談這問題的有第四期上的『工人與政治』，牠把這問題說得很明白，希望你能够翻出來仔細看看。

我祇想告訴你一點：我們之所以確信中國民主運動乃革命運動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才能成功，乃是研究了近百年世界各國革命史，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以及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才加以確定的。這裏絕無一點感情作用在內。

階級才能修復其完全破損了的國家機構，才能重建其軍隊（用美國配備，由維希軍官指揮），才能恢復其警察和特務組織，才能發展其新的政黨使迎合小資產階級底傳統和成見。他方面，牠們又反對工人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整個共產黨以及牠的在政府中的部長（空軍部，勞工部，復興部，工業生產部，國務部）都藉口必需增加生產而反對工資『解凍』，——即不許增加工資。（法國工人工資現在凍結於四千至五千佛郎之間，祇修應付必需的生活之半數。）直至此次制憲會議前夜，共產黨才宣布牠也贊成增加工資了。共產黨如此支持法國資本主義，以致美國共和黨反動的評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也能說：『法國共產黨復興法國的綱領，并沒有一點比社會黨或人民共和運動更前進些，更左些。』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失望消極，而小資產階級改投別黨的票，難道有甚麼不能解釋的麼？此次選舉，共產黨從第一黨降為第二黨，而人民共和運動從第三黨昇為第一黨，難道有甚麼不能解釋的麼？

可是如上面表中數字所指示，階級力量對比雖有改變，仍是有限的。法國工人政黨和工會仍保有強大的力量。工人和小資產階級一般消極和失望固然是革命前途的暗影，但此次選舉仍有令人樂觀的光明投射出來，那就是另一個工人政黨『國際主義共產黨』（P.C.T.）走上政治舞台。

『國際主義共產黨』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已有十多年歷史了，一向是人數雖少而忠實於工人利益的正統的馬克思列甫主義的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起，牠即表明列甫的革命的失敗主義立場，到了希特勒軍隊侵入法國後牠即號召羣衆起來抵抗，牠參加和領導羣衆抵抗希特勒的運動，牠的機關報『真理』是法蘭淪陷後第一張出版的秘密報紙，牠的黨員給希特勒黨徒殺死了好多。總書記希克（Marcel Hic）死於布恆華克集中營內。其他重要領袖，邁希列，格根，昆斯特令克，蘇占，克勞，先後死於蓋世太保之手。赫斯特則為達爾手下的法西斯黨徒所殺。『解放』後，戴高樂政府不承認這個工人政黨合法存在，不許牠的機關報『真理』登記。戴高樂下台後，繼起的古益政府仍然堅持這個決定。直至法國社會黨一部分黨員起來抗議，美國，英國許多工人團體代為請求之後，到今年四月十五日，即此次選舉之前一個半月，這個黨才正式取得公開地位了。

國際主義共產黨一經取得公開，即參加選舉，在全國十一個選舉區內提出候選人名單，所得票數如下表：

巴黎第一區	四，六七七票
巴黎第三區	六，〇三九票
巴黎第五區	四，一五八票
菲尼斯德省	四，一六八票
季隆省	七，六九三票
伊色爾省	三，七五一票
瑪因省	三，六九〇票
悲得洞省	二，八九一票
龍河省第一區	四，九四九票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存在着兩個主要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其他階級如地主與小資產階級（包括城市貧民與鄉村農民），則是過去社會的殘餘，

不管他們數量上有多大，總是趨於沒落的，或不能起獨立作用的。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上的主要反動者是地主貴族，同時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都不大，所以代表歷史的進步力量的是資產階級。是牠，率領了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與小市民，去和地主貴族作戰。這是初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級構成。漸漸地，尤其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在世界的大部分掌握了統治權，殘餘的地主屈服於牠了，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受着牠的剝削與壓迫，主要的反動勢力變成資產階級了。這時候誰能率領廣大的羣衆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呢？當然祇有工人階級，因為小資產階級複雜龐大，自相矛盾，起不了獨立作用，祇能被領導而不能領導人的。

那末中國的反動砥柱是誰呢？有人說是帝國主義，有人說是封建殘餘，其實都不對。帝國主義不是直接統治中國的，牠經過代理人來統治，而封建殘餘却已經失去這代理人資格了。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中國的政權完全入於資產階級之手，這個資產階級政府無論從其政綱，政策，背景，關係來說，都祇能說主要是代表金融買辦官僚資本家利益的。牠外與帝國主義內與地主勢力締結着解不開的血緣關係。

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對發生厭惡，表示反對；但二者之間的距離極小，妥協極易，因為歸根結蒂，他們終究是一家人呀。要想靠這些中小型的資產階級領導一個

洛特與嘉倫省
薩伏衣省

九七〇票
一，四九三票
共 四四，九一五票

這票數在全國票數中的百分比還是很有限的，即約佔百分之〇·二三。但在革命前法國局勢中，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一來，表明法國政治舞臺上已有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即真為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政黨，來干涉了。在選舉前的運動中，這個黨散發了幾百份傳單，將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綱提出於人民面前，在巴黎及其他工業城市豎立了巨大的木樑，張貼動人的標語和圖畫，又參加了三百次公開會議，與敵黨熱烈辯論。這種宣傳和鼓動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二來，這四萬多票中，在巴黎的就佔據一萬五千票以上，其餘省份也是工業發達的居多，例如龍河省就是里昂城所在地，季隆省就是波爾多城所在地。這是表明，一部分失望了的工人來投這黨的票了。

但是議會選舉票數決不能忠實反映國中階級力量的對比。革命黨派在議會中的百分比總是比牠在議會外的力量低得多的。國際主義共產黨是法國一切黨派中唯一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牠認為在法國是如何根本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問題，而不是在這制度底下求改良問題。牠參加羣衆目前要求民主權利的一切鬥爭，但牠認為必須把民主鬥爭看做爲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鬥爭之一個部分，才有革命的意義。——總之，牠現在在法國採取的路線，正是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黨在俄國採取的路線。牠參加了制憲會議的選舉，但牠尤其關心議會外實際進行的階級鬥爭。

羣衆實際的階級鬥爭進行着，不願也不能完全納入議會主義孔道內，如共產黨和社會黨領袖們所期望的。本月二十日巴黎工人大示威就是一個證明。

原來反動派在六月二日選舉勝利之後過分興奮了，他們獲得議會勝利還不够，還想在議會外摧毀工人的力量。戴高樂上台後一向緘默，此時又說話了。他演說，要求一個「強硬的人」來組織一個「強硬的政府」。這話，在那些反動資產階級青年中間得到了響應，他們於十八日夜裏，即選舉臨時總統之前夜，亦即巴黎淪陷的紀念日，圍集了好多人，舉行示威，路過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所在的沙多丹廣場（Place St. Charles）時候，便把這機關的窗子打破了，鑽進去，把其中圖書館的書拿出來焚燒，一面喊着「戴高樂重掌政權！」「送托勒到柴堆上去！」「托勒（Thorez）就是法國共產黨總書記。這時已在深夜，街上沒有工人，因此沒有發生甚麼衝突，這些「金色青年」做完了他們的工作之後，警察就很客氣地把他們遣散了。

第二天選舉總統時，法國共產黨議員提出了抗議。同時巴黎總工會和共產黨聯合號召於二十日舉行一個示威；得到社會黨，全國總工會和其他工人團體贊助，這示威遂於下午散工以前一個鐘頭開始了。

這是「解放」以後巴黎最大的示威，據說戰前幾年也未會有那麼多人示威哩。報載參加的有六十萬人。羣衆叫喊的口號有：「吊死法西斯！」「工人階級聯合萬歲！」「肅清反動分子！」「增加工資百分之二五！」「向暴利者作戰！」「打倒戴高樂！」「把勒執掌政權！」等等。後二口號分明是回答十八日夜裏的反動口號的。

堅決的鬥爭來反對金融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那是幻想。

學生自然比某些『民族』資本家急進些，不妥協些，但你得知道，學生本身是不統一的，在社會上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多階級（其中多數是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出身）的一個集團，所以他們可以對某些問題來一個共同行動，但等運動一深化，利益一明顯，學生本身先就分化：多數向右，少數向左。因此，學生是不能領導革命的，雖然他們可能領導一次示威或一次請願。

餘下來只有農民了。誠如你所說，農民人數多，生活苦，但毛病和學生一樣，他們不是一個階級。農民中有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中農，貧農，佃農，雇農。這些類別的農民，各以其利益之相近而接近城市中的相當階級。在反對地主時，他們可能形成一條戰線，但因中國農村階級分化之烈，這戰線很快會破裂的。破裂出來的一個偉大力量，但一因貧農之小私有者根性，二因農民的分散性與落後性，所以單憑他們的力量決不能有效地打擊資產階級。

現在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中國的工人階級了。雖然牠人數少，知識低，但因爲這個階級，集中在全國政治經濟命脈的點與線，最有團結，在社會生產中所佔的地位最重要，小有產者的成見與思想保存得最少，從生活上領悟社會主義的必要最容易，對資產階級的罪惡知道得最清楚，所以，要反對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亦即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與封建殘餘的保護人，就非由牠來領導不可了。

編者 八月十日

羣衆很熱烈地唱着舊日的革命歌曲，可是這些歌曲，共產黨早已廢除了，早已拿『馬賽歌』和其他的愛國歌來代替了。那些革命歌曲中，唱得最多的，是『國際歌』以及舊時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當心歌』，這歌的聲句是說：『革命開始了，這是一切饑餓的人翻身之日！』

羣衆在示威中的戰鬥情緒，是共產黨和社會黨領袖一向壓迫着的，這日有了機會宣洩出來了。羣衆自動喊出口號。共產黨雖然號召此次示威，卻不能控制羣衆。共產黨樂隊仍舊吹奏『馬賽歌』，共產黨工作人員散佈到羣衆中去制止『打倒戴高樂』和『托勒執掌政權』兩個口號，共產黨又叫羣衆叫喊：『要魯爾開煤炭！』等沙文主義口號。可是這些努力終不能掩蓋巴黎工人的階級鬥爭精神。

這次示威中羣衆戰鬥情緒的表現，不僅出於反動派意料之外，而且出於共產黨自身意料之外。共產黨自己那日以後也『左傾』了，爲的適應羣衆這種情緒，免得羣衆完全脫離牠的影響。次日，巴黎總工會領袖，共產黨員赫那夫，召集各工會書記開會，明白宣布：『我們已到反守爲攻的時候了。我們必須記得現在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過日子。我們必須鬥爭，必須曉得如何保持獨立，才能達到我們的要求。』關於增加工資的事情，他主張『廢除職業的軍隊，代以志願軍，裁減警察預算，沒收非法利潤，等等』。共產黨下層也有人起來批評上層的政策。有人說：『領袖們太容易受欺於三黨政府的騙局了』。有人提出：『社會黨和共產黨聯合政府』口號，而且說：『這不能專靠部長聯合的，必須有廣大的民主羣衆的行動。』可是上層領袖仍舊繼續以前的路線，他們不過利用那示威來向新總統索取更多的內閣位置罷了。談判結果，比多爾總統答應了他們要求的內閣的位置，又空泛允許將來要增加工資，共產黨便收回了這『增加工資』的要求，而再加入聯合政府了。

共產黨向來反對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總書記托勒在今年三月開的礦工會議上明白宣布：『生產第一，一切都須服從於生產，罷工是要幫助托辣斯的，增加工資祇能增加物價和造成通貨膨脹罷了。』六月二日選舉以前三天，共產黨才拋棄了這種態度，而贊助工人的增加工資要求。這顯然是爲了取悅於投票的工人的。現在選舉完了，共產黨又收回增加工資的要求了。但是『全國總工會』仍然堅持着這個要求。有人說：工會裏的共產黨人和政府裏的共產黨人有了衝突。究竟是有衝突呢，還是兩副面孔，則我不敢說。

國際主義共產黨則是始終擁護工人的增加工資要求的，牠提出了『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口號。這是第四國際過渡綱領中的口號。

法國局勢很可樂觀。兩個機會主義的工人政黨雖然放過了革命時機，領導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共組『聯合政府』，即屈服於資產階級政權之下，但革命潛能仍然保持着。選舉中國際主義共產黨之出現，示威中工人戰鬥情緒之表示，二三次『聯合政府』試驗失敗將引起工人懷疑和反對，——這一切都告訴我們：這個模範的革命之國是有可能再掀起一次大革命的。但願『國際主義共產黨』能迅速發展，成爲法國無產階級真實的領導者，那時不僅工人能更堅決，更有戰鬥精神，而且小資產階級也能更不動搖，更有信心站在工人方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於巴黎